

教育改革背後的東方道德理念

王殿卿

北京東方道德研究所

近 10 年來，中國大陸部分地區的學校開始探索與實施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道德教育，引起了海內外各界的關注，也遇到了種種認識問題。在當今的時代，為何要進行這項教育？這種教育(1)、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嗎？它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倒退？(2)、傳統文化與道德，在實現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是一種精神動力，還是一種思想文化的阻力？(3)、如何分清傳統文化與道德之中的精華與糟粕，這項教育會不會造成庸文化糟粕毒害當代青少年？(4)、如何處理道德、尤其是傳統道德教育與政治教育的關係，這項教育會不會削弱學校的政治教育？(5)、在過去的百年中，傳統文化與道德一直是被革命的對象，今後在社會主義新文化與新道德的建設中，它將會充當何種角色？(6)儒家倫理在中國傳統道德中佔據主導地位，強調儒學的當代價值，會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是否會導致庸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對於這些問題的回應，關係著這項教育的命運，關係著新世紀中國大陸學校道德教育與社會道德建設的文化與傳統的根基，關係著能否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道德，因此，對於這項教育的當代價值及其依據的研究與回答，就顯得十分必要。

進步與倒退

在過去的 100 餘年，中國經歷了三次大的政治變革，一是康、梁變法，效法日本的明治維新，企圖建立君主立憲制而失敗；二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以法蘭西的民主共和為榜樣，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三是中國共產黨堅決“走俄國人的路”，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1991 年，蘇聯和東歐先後解體，給中國人“以俄為師”和學習西方畫上了句號。於是，中國向何處去？再次要求每個中國人做出選擇。有一種主張，是從經濟體制、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等“全盤西化”；另一種主張，是“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兩種主張公開與不公開的論爭，就成為連續不斷的社會“風波”與“動盪”的深層內因。

1992 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選擇了鄧小平的理論，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同志提出研究亞洲“四小龍”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東方模式”，指引我們思考與研究東方文化與“東方模式”、中國文化與“中國模式”之間的內在聯繫，也就是研究民族文化在實現社會現代化中的特殊價值。於是，中國人、外國人開始重新反思與對待中國的文化，一百餘年來、尤其是 80 年代的“西方文化熱”，被 90 年代的“中國文化熱”理所當然地取代了。中國人開始擺脫歷史上形成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有了新的認同、自信與自尊。

一個國家，在政治上獨立、經濟上開始富強之後，就必須有文化上的復興。否則，就難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難有完整意義上的民族偉大復興。

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靈魂，離開道德的文化必然是腐敗的文化。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靈魂，是代代相傳、世世發展的民族智慧，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精神力量。對於新一代中國人進行中華美德教育，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傳統與現代

傳統文化與道德，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動力，還是一種阻力？是一個已經爭論了近百年的老問題，當今，又成爲進行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教育必須回答的新問題。如果是屬於“阻力”，那麼此項教育實驗就失去了前提。

較早將中國傳統文化看作“阻力”的代表人物，是德國人馬科斯·韋伯。他在 20 世紀初撰寫和出版了兩部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道教與儒教》。他認爲，歐洲自 1789 年法國大革命以來，市民社會的飛快發展，是得益於一種精神動力，即以新教倫理爲靈魂的資本主義精神；中國近代之所以貧窮、落後，不能實現市民社會，正是缺乏西方那種精神動力，而沒有經過革新的道德與儒教，就成爲國人的精神桎梏。韋伯這種以西方是非論是非的“西方中心論”，盡管抹煞了滿清政府的腐敗與反動，也掩蓋了西方列強對中國長期侵略與掠奪的歷史罪過，然而，他的這套“理論”，卻被當時一批中國的精英所接受，並加以“炒作”之後，就逐漸在中國人當中形成了一種文化自卑的情緒，使得中國人長期在世人面前挺不直自己的文化脊梁。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在中國似乎只有愚昧與落後，沒有文化與文明；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中國文化似乎已經被“開出了球籍”。

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認同、自尊與自信的“殖民地文化心理”影響深遠，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河殤》主張用“藍色”文明取代“黃色”文明。

在對待“傳統”的百年評判中，逐步形成了一種比較根深蒂固的“反傳統的傳統”，化解這種“反傳統的傳統”，尚需時日。

傳統，是世代相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遺產。

傳統文化，是世代相傳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爲準則和風俗習慣。它既有強烈的歷史遺傳性，又有鮮活的現實變異性。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制約著每個人。傳統文化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也就有了自己的傳統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結晶，也是中華民族對於人類的偉大貢獻。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是人類文明中一筆寶貴的財富，它與各民族的優秀文化相互交融，造就了全人類的文明，在世界文化的寶庫中，中國傳統文化有其獨特的魅力，有不朽的生命力。它有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字，浩如煙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藝，精采紛呈的文學藝術，雄偉輝煌的建築，充滿智慧的哲學宗教，完備深刻的道德倫理等等，都是中華民族引以自豪的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人，之所以能夠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也是開創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與新道德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傳統是歷史的產物，它隨著人類歷史的進程而不斷發展和變化。傳統有落後於時代的成分，但傳統不等於落後；傳統有其凝滯性，但傳統不等於保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主要是形成於封建社會，但傳統不等於封建。

傳統，既有空間的局限性，又有超時空的無限性。它是在代代相傳的過程中，不斷充實和更新內容，在不斷向現實靠攏，並不斷爲現實服務的進程中得到不斷發展。批判與繼承，是傳統存在與發展的內在動力與外在形式。

對待傳統，應有清醒的認識和正確的態度，不能簡單地肯定或否定。籠統地、盲目地反對一切傳統，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它是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根源。

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已經浸透了所有中國人、所有海外同胞的心田。中華文化具有比血更強的凝聚力，它能夠把全世界中華兒女的心連在一起。

不尊重自己文化傳統的民族，是沒希望的民族。

1990年3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南海懷仁堂，與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座談時說：“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我們中華民族所以能在世界屹立五千年，就是因為我們有著優秀的民族傳統和民族精神”。

1997年11月1日，江澤民同志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中指出，從歷史文化角度來了解和認識中國，是一個重要角度，因為現實中國是歷史中國的發展；中國的文明傳統，一直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國的發展方向；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形成了：團結統一的傳統、愛好和平的傳統、獨立自主的傳統、自強不息的傳統。這些論斷表明，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至今仍然是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精神動力。

精華與糟粕

在中國5000餘年的傳統文化當中，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因此，毛澤東同志早就提出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基本原則。然而，這一正確的原則並沒有在實踐中真正落實。在經久不衰的反封建的聲浪中，傳統文化中越來越多的成分被當做“糟粕”橫遭批判與打倒，以至於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封建糟粕。於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能夠傳承下來的精華越來越少，而它的糟粕卻不斷地“借屍還魂”。這就使得一兩代的中國人，與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拉開了距離，從不感興趣、不願意或不可能接觸，到知之甚少，以致無知。然而，對於自己民族文化越是無知的人，越是膽大妄為，越是敢於“全盤否定”、“徹底砸爛”。這些無知的人，對於“藍色文明”的精華，也是一知半解，於是就將“藍色文明”中的糟粕當做“精華”，變成了東西方文化糟粕新混合的“新載體”，成為一代沒有文化根基的“斷了線的風箏”。失去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精華，又沒有消化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就必然生成一種東西文化糟粕相混合的“劣質文化”。這是值得反思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中西文化關係史啟示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成分，具有超越時空、超越階級的品質，她對於人類文明進程具有普遍價值。只有以自己民族優秀文化為基礎，借鑒吸收一切外來文化的精華，結合當代社會現實，才能夠建構或整合出新的文化。試圖離開或拋棄自己民族文化，去構建什麼新文化，就如同揪著自己頭髮想離開土地一樣的不明智。

1994年初，江澤民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外來的文化。我們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很好地繼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

1991年12月19日，江澤民同志在廈門大學與師生座談會時說：廣大青年是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是祖國未來的建設者，對他們要經常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教育，同時也要經常進行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教育。例如：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等，對於激勵人們的愛國熱忱是很有作用的。應該說，這些話都是我們民族文化中一些富有哲理，教人正直、忠貞、有抱負的名言。學習和掌握它們，對於自己立身行事，為國家，為人民建功立業，是會受益匪淺的。

為了矯正建國以來沒有認真，系統、有效地，對青少年學生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失誤，199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關於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1994年中共中央，關於愛國主義教育和加強改進學校德育的兩個文件，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都對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從此，接受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教育，成為每個公民的權利；對學生進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教育，也就成為每位教育工作者的義務。

為了落實中央的這一系列的精神，1995年年底，由李嵐清同志主持，教育部具體組織實施，羅國傑教授主編的《中國傳統道德》一書正式出版。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集中國內一流學者，對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資源，所進行的大規模開發。李嵐清同志在此書的序言中指出：“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根本目的，在於結合

革命傳統教育，更加振奮我們的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在於使社會主義道德具備更為豐富的內涵；在於更好地協調人際關係，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在於使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成為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的主旋律，並形成適應社會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範疇。”他還指出：“《中國傳統道德》可作為德育的參考教材，在學校試用一段時間，收集一下各方面的意見和反映，然後再組織力量，在此基礎上編寫出適合各級各類學校學生使用的教科書”。

1997年6月，李嵐清同志在全國中小學德育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開發革命傳統和我國優秀傳統兩種特有的德育資源，對青少年進行教育，把實現德育總體目標與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結合起來，把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和人民革命以及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形成的革命傳統結合起來，賦於新的時代內容，吸收世界的先進文明成果，豐富和完善有中華民族特色，體現時代精神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規範。

政治與道德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30年，學校的德育任務與內容主要是進行政治教育，甚至一度用“突出政治”取代了其它思想道德教育。因此，至今有些中小學校仍然保留著“政教處”、“政治課”等等歷史概念。重政治輕道德的教育理念，並沒有因為黨和國家工作著重點的轉移，而有所改變。這種教育理念的直接後果，就是逐步削減了學校道德教育，使得一代以上的中國人道德素質下降、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日益衰敗。可見，一個國家如果在10-20年內，忽視對於新一代國民進行道德教育，那麼就會在15-20年後，使得整個社會承受道德淪喪懲罰。因此，對於道德及其教育的功能，不能過於功利，不能追求立竿見影的教育效果，有遠見的政治家、對民族歷史命運負責任的政府，都會重視“德治”，重視精神文明建設，重視“以德化民”、“化民成俗”。

2001年1月10日，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主要講話中指出：

“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範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一重要講話，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德治思想以及道德教化的智慧明確了方向。

人類所嚮往的社會，是以“小康”與“大同”為標誌的倫理社會，而不是一個法律多如牛毛、監獄遍佈全國、警察無處不在的法制國家。法制是實現倫理社會過程中的一種手段。道德與法律，是社會正常運轉的鳥之雙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道德教化是法制建設的基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對於制約人的行為來講，道德是一種內在的自律，法律是一種外在的他律。當一個人不能自律的時候，就需要由他律來制約。然而，就其大多數人而言，他們主要、經常、大量的行為，是通過自律來調整的。這就需要提升人自身內在的道德素質和修養。

道德，歸根結底是社會經濟關係的反映，但它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就會成為一種社會力量。

道德本身不講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是它又離不開功利。所有道德行為，都是一種價值判斷與選擇，或多或少都是以犧牲個人、集體利益為代價。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德的本質是利他的。然而，在經濟等一些領域中，道德又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它又能夠給人們帶來或多或少的利益，“有德則有財”。制假、賣假，坑蒙拐騙，謀財害命等等有背於道德的行為，或早或晚都會招致事業失敗、企業破產、身敗名裂。

市場經濟需要法制的約束，更需要道德的規範。規範與成熟的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初級階段，出現一些不道德現象，具有歷史的暫時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需要建立人無誠不立、業無義不興，國無信不貯的道德規範。一個經濟大國，必須首先是一個道德大國。

道德與政治是難分難舍的。政治決定著社會發展方向，道德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沒有道德的政治，必然是腐敗的政治。

以德治國，要求君與臣都要“以德為本、以德修身、為政以德”；強調所有君與臣都要“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要以德治國，必先“以德治吏”，“吏德”，是一種政治道德。

社會道德風尚的興衰與政權的興衰，有著必然的聯繫。而統治集團道德風尚，主導著整個社會道德風尚。統治集團的道德衰敗，必然引導社會道德風尚的衰敗，當這種衰敗達到一定程度，超過某種警戒線的時候，改朝換代就勢在難免，這是一種歷史的明鑑。中華民族偉大之處，就在於她具有健全的道德更新的能力，歷經多次崩潰，而又能夠在廢墟之中重新站立起來。

自從 1986 年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定以來，對於國民的素質要求就有了統一的標準，這就是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將“有道德”放在了第二位，可見道德素質與道德教育的重要。因此，落實中央關於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精神，要著重研討如何加強學校德育——道德教育——中華美德教育。

文化革命與文化建設

在 20 世紀前 80 餘年間，中華民族文化的歷史處境每況愈下，長期被作為否定、批判、打倒、以至革命的對象。“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歷史罪錯，就是從“掃四舊”、“評法批儒”到“徹底砸爛”中國傳統文化，它對中國有形的物質文化的破壞，是有目共睹的，而給一代人心目中所留下“文化思維定式”的陰影與“文化內傷”，是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撫平的。

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智慧。一個對於自己民族文化失去認同、自尊與自信的民族，是永遠不能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對於以往對自己民族文化的“不斷革命”，應有清醒的反思。

對於傳統文化需要批判繼承。然而，批判是手段，繼承是目的。如果在實踐中只有批判，少有繼承，或者不繼承。那麼，手段就會變成了目的。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難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建設。

對於傳統文化需要破與立，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然而，“破”應當是為了“立”，“破”不是目的。“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曾經是一種文化革命的指導思想，它是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砸爛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整體戰略思想在文化領域的運用。如果，破字當頭，變成了破壞當頭；不破不立，變成了只破不立。如果破中國文化，立西方文化，把中西文化視為一種對立，甚至以否定和犧牲中國傳統文化為代價，全盤肯定和吸收西方文化，就必然導致中國文化被砍斷了根，西方文化又難以被中國人所認同並在中國大地上難以生根，進而造成一、兩代中國人對於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深感陌生，使得中國長期不能夠整合出一種適應時代潮流的新文化，這可能是中國文化建設的歷史教訓。

批判與破，都一度成為文化革命的手段。文化大革命，通過大批判、通過破四舊，並沒有把封建文化的糟粕掃進歷史垃圾堆。相反，封建文化的垃圾，卻借屍還魂，與當代西方文化垃圾相混合，並不斷進行“現代轉化”，使得當今中國的道德文化與風尚，越來越令人憂慮。

對於傳統文化，批判不能取代繼承，革命不能替代建設。沒有建設的革命，只能撞擊或沖擊文化，損傷文化的元氣，導致文化枯萎；只有將革命與建設相融合，才能使文化得以生存、復興與繁榮。

只有著眼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新道德、新風尚，才能有足夠的文化正氣和力量，震懾歪風邪氣，重建禮儀之邦！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需要轉變觀念。同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也需要轉變觀念。否則，仍然運用以往的文化革命觀念和文化路線，指導今天文化建設的實踐，那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是斷然建設不起來的！

對於 100 年以來的“文化革命”進行歷史的反省，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與教訓，進而轉變國人的文化觀念，以便正確對待中國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切外來文化及其兩者之間的關係；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正確對待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文化建設與社會全面進步的關係；正確對待人文主義與神文主義的關係；正確對待人類文明進程中的“衝突”與“對話”的關係。這些觀念的變革，將是落實十五大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而把中國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條件。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

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道德教育，必須正確認識與處理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是不會被儒學取代的。否則，馬克思主義就實在沒有生命力了。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真理性，有著堅定的信念和信心。

其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不是絕然對立的。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中國 5000 餘年的文化與智慧，是人類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量歷史資料表明，馬克思主義思想淵源中，就已融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早在 1945 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1905--) 出版了他的《孔子與之道》一書。他對中國儒學在 17-18 世紀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對法國啓蒙學者的影響，做了極其翔實的闡述和論證。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

“眾所周知，哲學的啓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爲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茲、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在儒學的推動下，中國早就徹底廢除了世襲貴族政治，現在儒學又成爲攻擊法國和英國世襲特權的武器。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爲背景的民族主義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一是德國的古典哲學，其創始人是萊布尼茲，他對中國的二進位數學和宋明理學都有較多的研究；二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其創始人之一是亞當·斯密，而亞當·斯密的老師是法國“百科全書”派的權威之一魁奈，魁奈作爲當時重農學派始創人，被公認爲“歐洲的孔子”；三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它誕生於以巴黎大學爲中心百年“中國文化熱”的背景之下，恩格斯曾經著文論證它與中國《禮運篇》思想之間的關係。

第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是一個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過程。中國革命需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使得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與此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馬克思主義作爲外來的西方文化精華，要在中國被認同、接受、運用、開花與結果，就必須扎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上。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都是“洋爲中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範。一部中國近代史表明，任何外來的文化，如果不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把自己的根扎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沃土之上，即使是文化的精華，也不可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是種子與土地的關係，馬克思主義也不列外。馬克思主義要在新世紀大放光芒，就需要與中國傳統文化有新的結合。而新一代中國人只有對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有較多的了解，才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根基。否則，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的頭腦中只是空洞、僵硬的教條，或者成爲他們升學、考試、拿學分的一種“工

具”。進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道德教育，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文化的教育，有助於青少年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

第四，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它使中國共產黨成爲真正的共產黨，它使一批批優秀中國人成爲真正的共產黨人。文化是每個人生命的一部分，中國傳統文化使得每一個中國人成爲真正的中國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指導人們認識、整理、開發、利用、繼承、和創新中國文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主義不是中國文化，它與中國文化精華相結合，推動中國革命與建設從勝利走向勝利；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不能取代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夠取代中國文化。將兩者視爲相互對立或彼此可以取代的觀點是錯誤的，它必然造成理論上的混亂和實踐上的誤導，既不利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也影響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